

# 《左傳》因果式敘事與以史傳經

## ——以戰爭之敘事為例

張高評\*

### 【提要】

《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或先《經》，或後《經》，或依《經》，或錯《經》，往往融會「如何書」與「何以書」，而蔚為敘事之藝術。《左傳》之敘事邏輯為二元論述：一則側重象徵式敘事，一則凸顯因果式敘事。因果式敘事，側重行為動機，強調行為和後果間之必然聯繫。《左傳》因果式敘事之重大成就有三：其一，以行為之因果報應，代替宗教的預言；其二，由行為自身之因果關係，證明善惡在歷史中所得的勸懲。其三，綜合呈現行為因果的原委，避免偏枯抽象之論斷。《左傳》強調天人合德、天人交錯，往往經由人事道德因果之敘事，化為成敗興廢之判斷準據。本研究選擇《左傳》之戰爭敘事為文本，以行為之因果為主軸。論述攸關戰爭成敗之敘事藝術，析分為道德性因果與策略式因果，往往以道德倫常為圭臬，作為善惡因果報應之準據。戰爭勝負固取決於兵法謀略之策劃，而敗亡或起於失德毀常，和平勝利亦緣於修德省德、明德綏德。要之，《左傳》戰爭之敘事藝術，出之以道德性因果者為多，此其最大特色。

**關鍵詞：**《左傳》 戰爭敘事 道德性因果 因果式敘事 以史傳經

---

\*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 一、前言

孔子作《春秋》，依據魯國國史，而加乎筆削褒貶於其間。《孟子·離婁下》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sup>①</sup>其事可考，其文可睹；然其義迷離難知，即孔門高弟子游、子夏亦不能贊一詞。於是而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各以其所得所見解釋《春秋》。《三傳》解經，各有所得，並有所失，前賢論述極詳，茲不贅述。<sup>②</sup>

載事、修辭、取義三者，為孔子《春秋》一書之組成元素。宋朱熹(1130-1200)曾謂：「《春秋》煞有不可曉處」；「《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故朱子大儒，著述等身，卻未有《春秋》學之專著。<sup>③</sup>《朱子語類》徵存朱門弟子之答問，曾言《春秋》，「蓋有言外之意」；稱《春秋》於義理，「都不說破」；<sup>④</sup>由此觀之，世人欲藉《春秋》之載事、修辭，以探究孔子之所取義，若不知憑藉，不得要領，自然求索無門，因《春秋》「都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故。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述說《春秋》，發現莊公七年《公羊傳》徵引《不脩春秋》曰，持與「君子修之曰」相對照，遂判斷「孔子對《春秋》舊文必有修正無疑」；進而推論：「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辭與事本該合一不可分，所以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sup>⑤</sup>「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會合事與辭而一之，則孔子《春秋》寄寓之微言大義，可求索而得。錢穆援引《禮記·經解》之文，提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可以破解《春秋》之「不說破」，亦有助於尋繹《春秋》之意在言外。

《三傳》解釋《春秋》經，各有異同。大抵而言，《左傳》側重歷史敘事，《公羊》、《穀梁》關注義理哲學。《左傳》呈現春秋時事，《公》、《穀》注目代聖立言。朱熹較論《三傳》得失，曾稱：「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

① 戰國·孟軻著，宋·朱熹注，《孟子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8〈離婁章句下〉，頁300。

② 參考張高評，《左傳導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第二章〈三傳之得失與會通〉，頁13-23。

③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卷83〈春秋綱領〉，頁2144、2176。

④ 同上，頁2149、2153。

⑤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0、2006），〈春秋〉，頁20-21。

《左傳》首尾通貫」；「《春秋》之書，且據《左氏》」；又云：「《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sup>⑥</sup>蓋有見於《左傳》敘事見本末，長於「屬辭比事」之《春秋》教故也。元趙汭（1319-1369）述其師黃澤（1260-1346）之說，亦謂：「《公羊》、《穀梁》不見國史，多是臆度之辭」；「說《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sup>⑦</sup>趙汭所謂書法，指《春秋》之筆削褒貶、微言大義之倫；即《孟子·離婁下》所謂「丘竊取之」之取義。《左傳》以史傳經，發揮比事屬辭之《春秋》教，故往往能經由事實考據，而得書法之大凡。

敘事、史學、比事屬辭，三者相通相融，而《春秋》與《左傳》有具體而微之體現。清章學誠（1738-1801）專攻史學，為傑出史評家，所著《文史通義》於此有較明確之提示，其說云：

《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sup>⑧</sup>

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原本於《春秋》「比事屬辭」。<sup>⑨</sup>

朱熹曾稱：「《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左氏》長於敘事藝術，千古無出其右。唐陸淳（?-770-805-?）《春秋集傳纂例》謂《左傳》：「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sup>⑩</sup>《左傳》敘事，能「備其事之始末」，此一優長特色，蓋發揮歷史敘事之優勢，其原本實出於「比事屬辭」之《春秋》教，此為《左傳》傳經之最大貢獻。本文發論，即植基於上述《左傳》「以史傳經」之特色上。

唐陸淳、宋朱熹、元趙汭、清章學誠諸家，評騭《三傳》解經之優劣，所以獨推《左傳》者，正著眼於以歷史敘事方式解經。筆者曾撰〈《左傳》據事直書與以史傳經〉一文，討論直書之書法與以史傳經之關係，側重在《左傳》

<sup>⑥</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綱領〉，頁2148、2149、2151。

<sup>⑦</sup> 元·趙汭，《春秋師說》（臺北：大通書局，1970），清·徐乾學、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26冊，卷上，頁16、17，總頁14925、14926。

<sup>⑧</sup>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內篇一，〈書教上〉，頁8。

<sup>⑨</sup> 同上，外篇三，〈上朱大司馬論文〉，頁308。

<sup>⑩</sup>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臺北：大通書局，1970），《通志堂經解》本，卷1〈三傳得失議〉，頁4，總頁2358。

解經方法之研究。<sup>11</sup>對於歷史敘事本身，缺乏探索。學界研討《左傳》之歷史敘事，有所謂「象徵性敘事」與「因果性敘事」，就偶然性與必然性，論述《左傳》的二元敘事邏輯。<sup>12</sup>其說甚有味，頗可取，然有餘未盡，故筆者草撰本文，以補闕發皇之。

## 二、歷史敘事、歷史解釋與以史傳經

### (一) 歷史敘事與以史傳經

《嚴氏春秋》引《孔子家語·觀周篇》稱：孔子與左丘明同乘觀周，歸而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傳》。由此可見，經之與傳「同作具修，相持而成」。<sup>13</sup>班固《漢書·藝文志》本之，亦謂孔子「與左丘明觀其史記」，左氏「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sup>14</sup>桓譚《新論》亦言：「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sup>15</sup>《左氏傳》與《春秋》經關係之密切，有如此者。

《左氏》之爲書，義經、體史，而用文。就比較而言，《左傳》側重以歷史敘事方式，詮釋孔子《春秋》經；《公羊》《穀梁》強調以歷史哲學視角，解讀聖人《春秋》經。《左氏》以歷史傳經，與《公》《穀》以義理解經不同。《三傳》傳體不一，皆以所得釋《春秋》，彼此可以相互發明。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曾有論辨，可以參看。<sup>16</sup>

《左氏》解經方式，與《公羊》《穀梁》不同：《左氏》以歷史敘事方式解釋《春秋》經，與《公》《穀》以歷史哲學大異其趣。錢穆曾云：「專講歷史價值，孔子《春秋》，可說遠在《左傳》之下。」以歷史敘事方式解經，徐復觀稱之爲「以史傳經」，其特色是透過歷史敘事，讓歷史自己講話，還歷史本來面目。故徐先生以爲：「《左氏》採用了以史傳經的方法，其意義實遠在傳經之上。」《公》《穀》以義理解經，無案而斷，自以爲代聖立言。宋蘇轍

<sup>11</sup> 張高評，《春秋書法語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頁13-36。

<sup>12</sup> 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四章，二、〈《左傳》的二元敘事邏輯〉，頁136-148。

<sup>13</sup>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章太炎全集》第二冊，頁858、829-830。

<sup>14</sup>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30，頁1715。

<sup>15</sup> 宋·李昉等纂集，《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610，頁2746。

<sup>16</sup>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章太炎全集》第二冊（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頁821-822、845-846。

《春秋集解》云：「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又曰：「《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元黃澤治《春秋》，主張「解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兼採《公》《穀》大義」，《四庫全書總目》不云乎：「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觀點亦自相近。

《左氏》以歷史敘事解經，其重要方式大抵如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所言：「《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sup>17</sup>其中，「依《經》」、「錯《經》」云云，大抵指以《傳》附《經》，隨文解說。至於「先《經》」、「後《經》」云云，則指無經之《傳》而言。<sup>18</sup>無論依《經》、錯《經》、先《經》、後《經》，皆是《左氏》以歷史敘事解經之方法。孔子曾言：「徒託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左傳》以史傳經，徵信於行事，觀其始末，容易得其是非。

《左傳》以編年史敘記春秋一代之歷史，就屬性而言，自是「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之史書。《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sup>19</sup>由此看來，提供成敗禍福之實錄，以及善善惡惡之資鑑，成爲《春秋》、《左傳》著述之旨趣。《史記·太史公自序》所云，固以之品目《春秋》，然《春秋》約其文辭，往往「推見以至隱」，其事難明，其旨難知，其書法未易辨。《左氏》之解釋《春秋》，形式多元；徐復觀先生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則是以史傳經。以史傳經，是讓歷史自己講話，還歷史本來面目；與《公》《穀》以義解經，代聖立言，大不相同。<sup>20</sup>

自中唐啖助、趙匡論《三傳》得失，已標榜《左傳》之優長：「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sup>21</sup>至宋，蘇轍著《春秋集》，以史乘看《左傳》，曾言：「故凡《春秋》之事，當從史。

<sup>17</sup> 周·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卷首，頁11。

<sup>18</sup> 汪高鑫，《中國史學思想通論·經史關係論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頁168。

<sup>19</sup> 漢·司馬遷著，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頁1370。

<sup>20</sup> 《左氏》之傳《春秋》有四大形式：一、以補《春秋》者傳《春秋》；二、以書法的解釋傳《春秋》；三、以簡捷的判斷傳《春秋》；四、以「君子曰」的形式發表自己意見。以史傳經，指《左傳》「以補《春秋》者傳《春秋》」。所謂「讓歷史自己講話，還歷史本來面目」，乃相對於《公羊》《穀梁》代聖立言、無案而斷而言。此所謂「讓歷史自己講話」，猶下文顧炎武所云：「於敘事中寓論斷」之法。參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卷3，頁270-273。

<sup>21</sup> 唐·陸淳釋，《春秋集傳纂例》（臺北：大通書局，1970.6），卷1，頁2358。

《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又曰：「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左氏》，史也。」又云：「《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非自以爲史也。世之爲《春秋》而不信史，則過矣！」<sup>22</sup>蘇轍強調：解讀《春秋》，專主《左傳》敘事；據史爲斷，反駁「以意傳經」。<sup>23</sup>元趙汭（1319-1369）編著《春秋師說》，發揚其師黃澤（1200-1346）之《春秋》學，亦主張「解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兼採《公》《穀》大義」。其說略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又謂：「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爲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sup>24</sup>就考求《春秋》書法而言，《春秋師說》已揭示諸多要領與方向，其立論焦點大多建立在《左傳》「以史傳經」之前提上。<sup>25</sup>清代《四庫全書》纂修館臣，撰寫《春秋》類〈提要〉，蓋紹述啖助、蘇轍、黃澤之說，推崇《左傳》「以史傳經」之特質與貢獻。如云：

夫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射覆矣。<sup>26</sup>

《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sup>27</sup>

徵存《左傳》事跡，有助於是非功過之認定；據史斷案，有助《春秋》書法之考察。《左傳》敘事詳備，「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考據《左傳》事實，可以得書法、杜臆說。凡此，皆《左氏》「以史傳經」之重要意義與偉大貢獻。

## （二）敘事解釋與以史傳經

漢董仲舒（？B.C.191-B.C.104？）《春秋繁露》〈俞序〉說《春秋》之大

<sup>22</sup> 宋·蘇轍，《春秋集解》（臺北：大通書局，1970.6），錢儀吉《經苑》本。上述引文，分見卷1，頁4；卷2，頁8；卷9，頁5。

<sup>23</sup>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第九章〈蘇轍《春秋集解》與以史傳經〉，頁384-402。

<sup>24</sup> 元·趙汭，《春秋師說》，卷中，頁1-2，總頁14932；卷下，頁4，總頁14944。

<sup>25</sup> 張高評，〈黃澤論《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載《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1），頁166-175、180-185。

<sup>26</sup> 清·康熙御定、紀昀等主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卷26，頁536。

<sup>27</sup> 同上，《春秋左傳正義》60卷〈提要〉，頁537。

旨，曾引孔子言：「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sup>28</sup> 徒託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故《公羊春秋》往往「借事明義」；<sup>29</sup> 《左傳》亦「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sup>30</sup> 以孟子《春秋》學觀之，孔子所竊取之「義」，必須經由史事之剪裁取捨，史文之表述詮釋，才能適切傳達褒貶勸懲，呈現微言大義。宋葉適《習學記言》稱揚《左氏》之敘事有本末，謂「既有《左氏》，大義有歸矣！」<sup>31</sup> 清朱彝尊《經義考》亦云：「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爲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sup>32</sup> 闡發事、文、義之密切關聯，《四庫全書總目》亦頗有論說：

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爲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sup>33</sup>

《春秋》之作，本之魯史；故孔子考證魯史，「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足以定「一字之褒貶」。丘明據《春秋》而作傳，敘事見本末，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因以求義，經文之褒貶勸懲乃呼之欲出。清方苞（1668-1749）著《春秋通論》，四庫館臣敘錄其書，謂其書「案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事」，「以經求經，多有合於情理之正」，<sup>34</sup> 示後人捨傳求經之要領。由此觀之，無論作史、讀史；作《春秋》，讀《春秋》，皆不可離敘事而空言義理，尤不宜捨棄《左傳》之敘事，憑空探求《春秋》之經義。否則，將緣木求魚，勞而少功。《四庫全書》館臣所謂「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由比事而定屬辭，藉屬辭比事而知史義褒貶，歷史敘事之重要，可想而知。

<sup>28</sup> 漢·董仲舒著，蘇輿疏，《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10），卷6〈俞序第十七〉，頁111。又，《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春秋緯》，作「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漢·司馬遷著，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370。

<sup>29</sup>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21。

<sup>30</sup>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30〈藝文志〉，頁1715。

<sup>31</sup>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9〈春秋〉，頁118。

<sup>32</sup> 清·朱彝尊著，林慶彰等編審：《點校補正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7），卷169〈春秋二〉，頁528。

<sup>33</sup> 清·康熙御定，紀昀等主纂，《四庫全書總目》，卷45〈史部總敘〉，頁958。

<sup>34</sup> 同上，卷29，「《春秋通論》四卷」提要，頁603。

敘事與解釋，為歷史之兩大要素。將以往曾經發生之事件，具體表述，忠實呈現；成敗禍福，據事徵存，是為歷史敘事。至於闡明歷史發展之軌迹，論述其意義之所在，提供後人之資鑑勸懲，此之謂歷史解釋。史學家須同時具備歷史敘事的藝術，和歷史解釋的藝術，方稱勝任愉快，不負使命。左丘明身為史官，精通史法，專擅於敘事藝術，唐啖助、劉知幾，宋呂本中、陳騭，清章學誠、陳壽祺、陳澧，民國韓席籌、馬宗霍諸家之說經、談史、論文，百慮而一致，皆稱揚《左傳》敘事之美妙。<sup>35</sup>其中，劉知幾《史通》〈申左〉，較論《三傳》得失，有所謂「《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外此，〈惑經〉、〈鑒識〉、〈敘事〉、〈模擬〉、〈言語〉、〈雜說上〉，亦多表彰《左傳》之敘事藝術。杜維運亦推崇《左傳》之敘事藝術，以為「史實比《春秋》敘述得詳盡曲折了，文辭比《春秋》優美委婉了，且其敘事有系統，有別裁，對重大問題往往溯原竟委，前後照應，使讀者相悅以解」，以為編年史敘事如此，是極高的藝術，其精湛似可獨步寰宇。<sup>36</sup>筆者曾為之發微闡發，就詩化修辭觀點考察《左傳》之敘事藝術，其史筆有五：用晦、貴簡、尚比、致曲、存真，姑作敘事藝術精湛之論證。<sup>37</sup>

《左傳》敘事之臻於藝術境界，已如上述。至於《左傳》之歷史解釋，所謂歷史評論者，如「君子曰」之作者抒論約 90 餘則外，尚有孔子曰、仲尼曰、叔向曰、臧文仲曰、季文子曰之倫，所謂聖賢重言，實不異「君子曰」。又有經義闡釋者，除「君子曰」外，尚有「書曰」、「凡」之例，而以「書曰」為最大宗。《左傳》史論之作用，大抵有十：曰褒美、曰貶刺、曰預言、曰推因、曰發明、曰辨惑、曰示例、曰補遺、曰寄慨、曰載道，已隱然具含歷史解釋之作用。<sup>38</sup>由此觀之，《左傳》號稱敘事文學之開山、史傳文學之祖始，其敘事藝術與解釋藝術所樹立之規模，皆足為後世所矜式。《左傳·成公十四》所揭示之《春秋》五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sup>39</sup>更融合敘事與解釋而一之，而蔚為影響後世史學深遠之「《春秋》

<sup>35</sup>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第九章〈為敘事文字之軌範〉，頁 151-153。

<sup>36</sup>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頁 90-93。

<sup>37</sup>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第二章〈《春秋》書法與詩化修辭〉，頁 51-76；第七章〈劉知幾《史通》及其《春秋》《左傳》學——兼論詩化之史學觀〉，頁 284-306。

<sup>38</sup>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頁 93-152。

<sup>39</sup> 同上，頁 165-175、183-201。



書法」。

歷來言《春秋》書法者，大抵可分「何以書」與「如何書」二派。<sup>40</sup>前者側重孔子作《春秋》之目的，亦即《春秋》書法之內容思想；後者凸顯《春秋》書法之形式技巧、表達方法。《公羊傳》、《穀梁傳》之倡「書法」，多闡釋「何以書」；《左氏》傳《春秋》，發明「書法」，主要表現在「如何書」，亦略提示「何以書」。論者考察《春秋》之義，曾提出「因文取義」十例，如同文見義、異文見義、詳文見義、略文見義、諱文見義、錯文見義、重文見義、微文見義、去文見義、闕文見義，固為《春秋》書法之表達方式，亦《公羊》學書法之所標榜。<sup>41</sup>就《左傳》所載《春秋》五例言之，前四例屬「如何書」之《春秋》修辭；最後一例「懲惡而勸善」，則揭示《春秋》「何以書」之歷史使命。錢鍾書曾云：「竊謂五者乃古人作史時心嚮神往之楷模，殫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sup>42</sup>錢鍾書視《左傳》為史傳，以為「五例者，實史家之懸鵠」。由此觀之，「《春秋》五例」「如何書」與「何以書」體用合一，文質融合，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同本共貫，往往相得益彰。

如果敘事與解釋，能冶兩者於一爐，當是最高明的藝術。<sup>43</sup>史學家就歷史事實的淵源、原因、發展、影響等方面進行解釋，無一不涉及敘事，無一不待詳細敘事而解釋始清楚呈現。從敘事到解釋，有時只將史實表出，不著解釋之痕跡，而解釋即清楚呈現。論者稱：史家就史實作適當安排以後，有時不明白解釋，便有解釋的力量，而且還能保持歷史之本色。<sup>44</sup>誠如清代章學誠所言，史家銓次群言，貴在抉擇去取；既經裁取，則貴陶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sup>45</sup>歷史之敘事與解釋，經由調劑變理，化而裁之，遂見其辭渾然如一。就《左傳》以史傳經而言，據事直書為敘事藝術之一，亦《春秋》書法之一。宋呂大圭《春秋五論》稱：「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所謂「史實自明」，即是歷史敘事與解釋之巧

<sup>40</sup> 有關「何以書」、「如何書」，可參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特質》（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頁20-29。

<sup>41</sup> 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經的性質》，《臺大文史叢刊》第二十八種（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1969），頁110-118。

<sup>42</sup>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頁161。

<sup>43</sup> 有關《左傳》敘事與解釋種種問題，歷代經學家、史學家討論不少，可參考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解經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

<sup>44</sup>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總經銷，1997），頁213-222。

<sup>45</sup>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方志略例三·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頁515。

妙化裁。

論者研究指出：《左傳》據事直書與歷史案斷，就「如何書」而言，大抵有四大要領，一曰以敘為議；二曰屬辭比事；三曰藉言作斷；四曰側筆烘托。<sup>46</sup> 史家但致力剪裁運化史料，以之敘事傳人，讓歷史人物自己說話，歷史事件如實呈現，史家不必現身說法，如此可以避免空言論斷。宋朱熹論《春秋》，稱孔子作《春秋》，「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sup>47</sup> 此種書法史筆之所以有此效力，顧炎武《日知錄》論《史記》敘事之美，稱「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史記》往往於「敘事中寓論斷」，<sup>48</sup> 《左傳》敘事又何嘗不然。

元趙汭《春秋師說》，提及研究《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sup>49</sup> 此就《左傳》敘事見本末，能體現《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而言。讀者嘗試考察《左傳》敘事之前後、異同、詳略，則孔子《春秋》筆削褒貶之書法呼之欲出。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一文，討論《春秋》之義、筆削之義，和一家之言之問題，亦足以相互發明。如云：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sup>50</sup>

孔子作《春秋》，蓋本《魯春秋》（即《不脩春秋》）進行抉擇去取、調劑變理。史料經由別識心裁之筆削，始見微言大義，乃成一家之言。章學誠之說，將筆削之義與一家之言等量齊觀，作為「欲來者興起」之撰述之嚴格要求。「成一家言」之撰述，既「欲來者之興起」，故其「抉擇去取，例不拘常，而

<sup>46</sup>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左傳據事直書與以史傳經〉，頁 22-35。

<sup>47</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春秋綱領〉，頁 2146。

<sup>48</sup>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卷 26，頁 1429。參考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80-97。

<sup>49</sup> 元·趙汭，《春秋師說》，卷下，頁 2。

<sup>50</sup>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頁 138。

其德爲圓」。<sup>51</sup>孔子思「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欲來者之興起」，故《春秋》有「義則竊取之旨」。孔子竊取之義，既聚焦於別識心裁之筆削，誠如章氏所言「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云云，反常合道，匪夷所思，富含創造性思維，故爲「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絕非「事具始末，文成規矩」而已矣。必具「獨斷於一心」之筆削，別識心裁之「成一家之言」，<sup>52</sup>乃可以「通古今之變」，而蔚爲史學之撰述。由章學誠論孔子《春秋》筆削之義、別識心裁，類推以研究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sup>53</sup>雖不中，亦不甚遠。

就歷史敘事與解釋渾然爲一而言，《左傳》據事直書之四大手法，即以敘爲議、屬辭比事、藉言作斷、側筆烘托，其抉擇去取，銓次群言，亦猶工師之度材，名醫之調劑，中有別識心裁，《左傳》敘事藝術方能贏得「著述罕聞，古今卓絕」之美譽。<sup>54</sup>余英時（1930-）院士曾較論章學誠與柯靈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之歷史思想，以爲章氏所謂《春秋》「筆削之義」，內涵實遠較「史料取捨」爲豐富；而當包括柯氏所說的史料取捨、歷史建設與歷史批評三者——柯氏持此三元素以說明史學思想的自主性，意即謂史學的堂廡賴此三大支柱而建立的。<sup>55</sup>孔子據《魯史》文本而加以筆削，其別識心裁體現爲「丘竊取之」之史義；左丘明據孔子《春秋》而作《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經，亦自有其筆削之義與別識心裁。《左傳》與《公羊》、《穀梁》各以所得所長解經，《左傳》於三傳所以自成一家者，當在工於敘事藝術，而以史傳經中之別識心裁，尤具關鍵指標。

### 三、《左傳》之因果敘事與以史傳經

學界研究《左傳》之敘事邏輯，以爲呈現二元論述：一則側重象徵性敘事，<sup>56</sup>如災異、卜筮、夢寐、形相、歌謠等預言之敘述。韓愈（768-824）所謂「《左

<sup>51</sup> 同上，《文史通義》，內篇一，頁12。

<sup>52</sup> 同上，《方志略例二·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既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頁468。

<sup>53</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14，頁235。

<sup>54</sup>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9），卷16，頁451。

<sup>55</sup>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頁216。又見氏作《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189。

<sup>56</sup> 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37-141。

氏》浮誇」，汪中（1744-1794）《述學》所謂：「《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其謂之謂歟？」

57 《文心雕龍·正緯》所謂「神道闡幽，天命微顯」；因巫術傳統，而神道設教，此左氏著述之用心。何況，預言敘事，往往富懸念之效果，有伏筆之效應，可以救編年之窮。原始宗教，常對人行爲之抉擇與歸趣，作預言性之指示。《左傳》以史傳經，往往徵存巫史文獻，凸顯偶然性機遇，堪作轉型期之見證。此即徐復觀所謂：春秋時代由原始宗教，通向人文史學成立之交錯交替現象。58

除上述之象徵式敘事、偶然機遇外，《左傳》以史傳經更凸顯因果式敘事，側重行爲動機，強調行爲和後果間之必然聯繫。此乃春秋史官企圖脫離原始宗教之制約，致力道德秩序建構之敘事策略，不失爲文化建設之創新活動。59 徐復觀（1903-1982）早已指出，《左傳》因果式敘事之重大成就有三：其一，以行爲之因果關係，代替了宗教的預言；其二，由行爲自身之因果關係，證明善與惡在歷史中所得的審判。其三，將構成行爲之果的許多因素，綜合調理起來，使人了解行爲的因果關係，避免了偏枯、抽象之論述。左氏最可貴者，當在「把宗教性的預言，轉變爲行爲的的責任，以合理性代替了神秘性」，人文史學之建立，左氏有推助之功。60 《左傳》強調天人合德、天人交錯，經由人事道德因果之敘事，移作成敗興廢之判斷準據，此種敘事方式，最值得大書特書。

因果關聯之尋求，爲史學致知之一大要務。史學家從事因果關係之分析，大抵想依循因果關係之線索脈絡，組織、描寫，以解釋確立之史實史事。注意之焦點，必然落在主要的，或較比重要的因果線索和脈絡上。動機，是其因，爲事件發生之必要或充分條件；人事之敬怠云爲，就是果。所謂最爲重要，或較比重要，是相對而言；大凡能導致結果，影響發展，促成變化之有關事象，和特定行爲，都是歷史敘事之因素。61 論者稱：尋求因果關聯有三大模式：其一，史實與史事間，就因果關係類型作研究；其二，就各個不同層次，探求

---

57 清·汪中著，蔣秋華、林慶彰編著，《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卷1，頁55。

58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學生書局，1979.9），卷3，頁268-269。

59 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頁137。

60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頁280。

61 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臺北：萬年青書店，不著年月），頁390-395。

歷史事件之成因；其三，就不同觀點，分析史實史事間之因果關係。<sup>62</sup>若此之比，皆值得參考借鏡。

《公羊》、《穀梁》，以義理解經，空言無事實，具思想史之價值，缺乏史學之意義。《左氏》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經，主要以行為之因果關係，作為善惡成敗自身判斷之依據。較之神秘之審判，較之聖人之勸懲，豈非更為莊嚴而深刻？《左傳》所以能跳脫原始宗教之制約，邁向人文史學之建立，蔚為一部偉大而完整的史學著作，主要是採用了以史傳經之方法，歷史敘事之策略。錢穆評價《左傳》為：「中國最先第一部最詳密的編年史。專講歷史價值，孔子《春秋》可說還遠在《左傳》之下」；<sup>63</sup>徐復觀亦云：「《左氏》採用了以史傳經的方法，其意義實遠在傳經之上。」<sup>64</sup>夷考其實，歷史敘事之藝術，為個中之關鍵。

《左傳》為中國最早且最詳密之編年史，歷史價值極高，此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之所稱揚。《左傳》既出於魯史官所記述，「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sup>65</sup>乃其職掌，且為其使命。故《左氏》以歷史敘事方式解說《春秋》，一方面達成史學「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之主書主法使命，且憑藉歷史敘事之演示，《春秋》所屬之辭、所比之事，以及筆削褒貶、微言大義諸書法，得《左傳》以史傳經，足以發微闡幽。

就《左傳》敘戰而言，每一場戰役侵伐，皆攸關「國之大事」。其中之成敗、存亡、禍福，皆互為因果，可作為古今資鑑之左券。《左傳》之敘戰大抵存有雙重模態：一方面體現任德尚義，標榜寢兵息民，是為道德性之因果。一方面又講究兵法謀略，追求克敵致果，是為策略式之因果。後者側重歷史敘事，據事直書，呈現客觀場景；前者「於敘事中寓論斷」，兼顧歷史解釋，表現主觀審判。史德與史義之二元論述，蔚為《左傳》敘戰關注因果敘事之一大特色。就戰爭敘事而言，道德性因果與策略式因果之兩致並書，相反而相成，皆有益於經世與資鑑。分論如下：

<sup>62</sup> 同上，〈史學致知中的因果關聯（下）〉，頁 412-417。

<sup>63</sup>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左傳〉，頁 40。

<sup>64</sup>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 275。

<sup>65</sup> 漢·班固，《漢書》，卷 30〈藝文志·諸子略〉。

## （一）以道德性因果為例

《左傳》之歷史敘事，層面多方，就敘事邏輯而言，有象徵性敘事、有因果式敘事，略如前文所云。今選擇因果式敘事，舉例論證之，以見《左傳》企圖跳脫原始宗教，建立人文史學之一斑。研究文本，則選擇《左傳》之戰爭敘事為範圍；行為之因果，乃本文論述之主軸。為便於討論攸關戰爭成敗之敘事策略，擬析分為道德性因果與策略式因果。請先言《左傳》所敘各大戰役，其成敗功過之敘事，吉凶禍福之解釋，多歸本於道德性之因果。

戰爭之成敗勝負，不僅關係個人之生死，家族之安危，國家之存亡興廢亦繫之。《春秋》撥亂世，反諸正，故《孟子·盡心下》曰：「《春秋》無義戰！」宋朱熹《孟子集注》：「《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sup>66</sup> 戰爭侵伐，為人類自相殘殺，動輒敗國亡家，故《春秋》書戰書伐，未有稱許為仁義者。《春秋》任德不任力，標榜文德仁義。<sup>67</sup> 左丘明因魯《春秋》而作《左傳》，敘事傳人，亦崇尚仁義，標榜道德。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左氏與孔子同恥，故所稱述，多與《論語》相表裏。<sup>68</sup>

《左傳·成公十三年》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為國外大事，與祭祀並列為國家大事。《孫子兵法·計篇》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雖以克敵致果為目標，一切作為仍須歸本於人道。綜要言之，《左氏》之義，不貴用兵，而在寢兵；不忍殘民，而在息民，與《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之旨相膺合，堪稱《左傳》兵學之大凡。<sup>69</sup> 論者研究指出，春秋時代隱然有所謂「國際公法」在，如不伐喪國、不伐亂國、禁通叛逆、處險不薄、禁傷敵君、禁殺俘虜、埋葬死亡、禁傷人民、禮待敵使、嚴律兵紀之類。<sup>70</sup> 漢劉向《戰國策·序》以為：春秋之時風，皆

<sup>66</sup> 戰國·孟軻著，宋·朱熹注，《孟子集注》，卷14〈盡心章句下〉，頁372。

<sup>67</sup> 戰國·孟軻著，東漢·趙岐注，清·焦循疏，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焦循《疏》云：「《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卷28，頁954-955。

<sup>68</sup> 清·姜炳璋，《讀左補義》，馬小梅主編，《國學集要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影印乾嘉三十三年同文堂藏版），卷首〈綱領下·表裏論語〉，頁104。

<sup>69</sup> 同上，卷首〈綱領下·寢兵息民〉，頁99。

<sup>70</sup> 洪鈞培，《春秋國際公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頁266-275。

知以道義相支持，仁義之道滿乎天下，有如此者。《左傳》敘述戰爭，往往以道德倫常為標準，作為善惡因果之審判。戰爭敗亡固起於失德毀常，和平勝利則緣於修德省德，明德綏德。《左傳》戰爭之敘事藝術，出之以道德性因果，蓋融合歷史之敘事與解釋於一爐，而張揚《國語·周語下》所謂「耀德而不觀兵」之義者。

如《左傳》敘息鄭竟之戰（隱 11）、周鄭繻葛之戰（隱 3），戰爭之肇因，皆由於道德之不修明：鄭莊公與息師戰，息師大敗。《左傳》借「君子曰」揭示息國「犯五不韙」，故敗喪其師。「不度德」、「不親親」云云，明指失德為因，造成「喪師」之果。此猶僖公十八年《左傳》載梁亡之因，為：「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一味多築城邑，而無人民充實之，好大喜功，自作孽，不可活。周鄭繻葛之戰（桓 5），肇因於「王貳於虢」，言而無信，導致周鄭交質，乃至周鄭交惡。「君子曰」點染「忠信」二字，凸顯明恕、明信，行之以禮，皆是道德倫常之大節目。又如齊魯長勺之戰，曹劌論戰（莊 10）；晉獻公假道伐虢，宮之奇諫言（僖 5），亦多持道德修為當作談說勸諫之依據：齊師伐我，曹劌問魯莊「何以戰？」君臣以惠、信、情、忠相對，亦是人文精神、政治倫常之發用。宮之奇諫假道，強調惟德是依、惟德是輔、明德惟馨，宣稱：「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君臣應對之際，已預示虞國之滅亡。將「明德」之作用，置於「神據」之上；昇華明德之馨香，取代宗教之神秘。宗教信仰與人文精神之交錯升降，由此可見一斑。

又如召陵之師（僖 4），堂堂正正；韓原之戰，恩將仇報（僖 15），亦是政治倫理之課題。辭令之發用，攸關修身與治平，在在皆為政治倫理之符號化表現。<sup>71</sup>清王源《左傳評》謂：「召陵以義勝干戈，而不失為玉帛，故作者但敘幾段詞命，而此舉尤切。」<sup>72</sup>孔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由此可見。秦晉韓原之戰，緣於晉惠公致命之個性特質，一則「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加上「復諫違卜」，又「乘異產以從戎事」，所謂自作孽，自取其敗。由行為自身之因果關係，導致成敗得失之審判，現世報應，理智而可信。

又如宋襄爭霸，功敗垂成，考其敗因亦有跡可循。預示成敗，為《左傳》

<sup>71</sup> 申小龍，《語文的闡釋》（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4），頁 301-308。

<sup>72</sup> 清·王源，《左傳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卷 2，頁 8。

藉言作斷之敘事常法。《左傳》編年以敘事，年月井然而患在事迹前後不連貫。預示成敗，令讀者生發懸念，不失為史書引人入勝之法，可以救編年敘事之病。如宋襄圖霸之有關敘事，《左傳》散見於僖公十六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五石隕宋，六鷁退飛，周內史叔興預言宋襄公：「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卻又強調「吉凶由人」，此原始宗教與人文史學交錯升降之現象。相形之下，較偏重人事：宋襄公「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司馬子魚斷言：「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宋人圍曹，以討不服，子魚勸其「姑內省德，無闕而後動」。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以為：「以人從欲，鮮濟」，亦斷其不成。宋襄公鹿上之盟、孟之會、薄之會、伐鄭，《左傳》皆藉言敘事，宣稱「小國爭盟，禍也！」「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所謂禍在此矣！」子魚深憂遠慮，提撕再三，盡人事以勸諫，奈何宋襄公不聽，愚妄已甚。清高士奇論之曰：「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飾虛名以取實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以是圖霸，不亦難乎？」<sup>73</sup>天變見於上，不足以示警；人事著於下，不足以規過，清汪中《述學》所謂「《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此之謂也。

左丘明身為太史，史官有主書主法之責，<sup>74</sup>故因經著傳，歸於經世資鑑。史之為書，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故得失與功過，皆富含啓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左傳》於天人之際，頗多關注。述存亡之跡，稽興廢之理，寓論斷於敘事之中，即成《左氏》之別識心裁，筆削之義。如晉楚邲之戰（宣 12），楚莊王於戰勝之餘，不為京觀，暢論「止戈為武」之人性關懷，堪作古今窮兵黷武之鑑戒。吳闈生治《左傳》，說《左傳》文法之奇，有所謂「正言若反」：「凡其所推崇褒大者，皆必有所不足；其所肆情詆毀者，必有所深惜者也。」<sup>75</sup>清劉熙載《藝概·文概》亦云：「《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sup>76</sup>以楚莊勝晉之盛，稱霸中原之威，而現身說法談武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楚莊王謙下為

<sup>73</sup> 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 35，頁 541。

<sup>74</sup> 閻步克，〈論樂官、史官文化傳承之異同及其意義〉，《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1998），頁 732-737。

<sup>75</sup> 吳闈生，《左傳微》（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卷首，頁 4-5。

<sup>76</sup> 清·劉熙載著，徐中玉等校點，《劉熙載論藝六種》（成都：巴蜀書社，1990），《藝概》卷 1，頁 6。



懷而言：「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由此觀之，雖戰爭之慘酷，攸關生死存亡，左氏仍不忘情敘說武德，人文史學之建構，已隱然成形。

又如城濮之戰前（僖 27），晉文教民之種種，亦側重強化軍人武德，以義、信、禮、恭等道德作為精神武器。如《左傳》載晉救宋圍，作三軍，卻縠以「說禮樂而敦詩書」，被推為中軍元帥，乃千古儒將之祖始。理由是：「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城濮戰前，由於「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晉文公乃以義、信、禮、恭教其民，於是戰勝楚國，「一戰而霸」，左氏以為「文之教也」，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左傳》開篇以來，春秋時代規模最大一場諸侯爭霸戰，決定晉楚爭霸成敗勝負之利基，竟然是跟殺戮侵伐相悖相反之道德倫常，諸如德、義、禮、讓、恭、信等之提倡，可見《左氏》以史傳經，提供經世資鑑，人文關懷，道德教訓等自是左氏之別識心裁，筆削之義。論者指出：「兵家主張治兵用仁義，用兵使詭詐；對民行仁義，對敵用詭詐。遵行詭詐與仁義相互為用的管理倫理。」<sup>77</sup> 覆按《左傳》用兵行軍之策略規劃，理或然也。

行軍用兵，領導統御方面，將帥之人格特質，往往影響，甚至決定戰爭之成敗，如城濮之戰（僖 28），楚令尹子玉致命之個性，注定了楚軍敗亡之命運。楚子將圍宋，令尹子文傳政於子玉，薦賈不賀。預言「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而且鐵口直斷：「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有了剛愎自用之個性，加上不守禮法之習性，於是格局影響了結局，預告了敗亡的命運。故楚成王命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卻抗命請戰，造成「王怒，少與之師」之損失。其後，「子玉怒，從晉師」，寫其衝動；使鬥勃請戰，寫其抗命，皆是無禮之形象分寫。待晉楚兩軍對陣，子玉揚言：「今日必無晉矣！」猖狂無狀，自大自滿至於此極。文末補敘子玉夢河神索瓊弁玉纓一段，特寫其剛愎自用，不聽建言，呼應「自敗」，亦順理成章。

《左傳》敘述《春秋》以來之戰爭，禍端多歸咎於失德、無德，成公二年晉齊鞏之戰以前多如此。大抵周德未衰，流而未滅，而以禮義相支持。其後漸變為戰國，於是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漢劉向《戰國策書錄》之

<sup>77</sup> 李桂生，《兵家管理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45。

感慨，不為無端。<sup>76</sup>襄公之後，世變日亟，人心不古，周德漸衰，遂多不凸顯道德性之因果敘事。晉齊鞏之戰之敘事策略，別識心裁，筆削之義，仍以政治倫理為依歸，如《左傳》、《穀梁傳》所敘。鞏之戰（成2）之肇端，緣於晉郤克私憤興師；而郤克大興諸侯之師伐齊，起於婦人之訕笑。《左》《穀》多有敘事，而《穀梁傳》詳於《左傳》。婦人非他，齊頃之母。由於同時而聘於齊者四人，或秃、或眇、或跛、或僂，齊使者各以其類御，而「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於是「婦人笑於房」，「客不悅而去」。齊頃公既蔑視盟主，助逆憑陵，今又訕笑嬉鬧，玩視士卿，自詒禍患，本無所逃罪。於是因為齊頃公之戲謔，導致鞏之戰之禍事。其後齊晉議和，郤克竟為洩笑客之恨，欲以頃公之母蕭同叔子為質。賓媚人乃駁斥其「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曰孝曰德，義正辭嚴，責晉以不孝令天下，有失霸主之氣度與格局。標榜道德修為，終使晉齊行成。

## （二）以策略式因果為例

史書之屬性，主要在「述往事，思來者」；而歷史之功效，在鑑戒勸懲，經世致用。唐劉知幾《史通·直書》云：「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曲筆〉亦謂：「史之為用，記功司過，彰善瘴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sup>79</sup>《左氏》以史傳經，敘事傳人強調道德行為之因果關連；敘述戰爭侵伐，勾勒兵法謀略，亦然。唯克敵致果，追求勝利成功，乃戰爭之終極目標，故或行詭道，或採奇計，或用離間，種種謀算之策略，當然無關於道德，卻與行為、策略之運作密切無間。

《左傳》之敘戰，呼應史書資鑑勸懲之使命，舉凡影響戰爭勝負，將帥成敗之因素，往往盡心致力凸顯，津津樂道敘寫。據筆者考察，影響戰爭勝負成敗之因素，依序為謀略之高下、將帥之性情、士氣之盛衰、武備之利鈍、軍隊之多寡，而以兵法謀略最為關鍵。史書既所以述往知來，因此從歷史事件之個案，歸納綜合出經驗教訓，甚至抽象出解決問題之原理原則，變得很有意義，很有哲理啟示。兵戎戰爭，既為國家大事，《左傳》為春秋一代之實錄，自然徵存極為詳備。同時，兵法謀略之策劃，在在影響行軍用兵成敗之關鍵，故《左

<sup>76</sup>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1195-1196。

<sup>79</sup> 唐·劉知幾，《史通通釋》，卷7，頁192、199。

傳》敘載尤多，此之謂策略式因果。

《左傳》敘當年攻戰事，堪作用兵者之隨方而取則，為將者所宜究心以淹通者極多。明陳禹謨著《左氏兵略》一書，枚舉歷代研習《春秋》、《左傳》名家，如關羽、杜預、岳飛、戚繼光等名將，可知經驗教訓，學以致用之一斑。又載錄〈《左氏兵略》題辭〉、〈進《左氏兵略》表〉，<sup>80</sup>從而可知《左傳》之兵謀寓於敘戰，而驗之於戰史，較之孫吳兵法之空言說理，為較可信據。清李元春亦有《左氏兵法》之作；<sup>81</sup>魏禧除著《左傳經世鈔》外，《魏叔子文集》有〈兵謀〉、〈兵法〉二篇，<sup>82</sup>發凡示例，要皆以《左傳》敘戰之史案為主。管理學界有研究策略規劃者，探討兵家管理智慧，曾關注影響戰爭之主觀因素，如將帥之決策、指揮、組織、運籌等軍事管理素質，並由此而引出戰爭勝利的一系列戰法。<sup>83</sup>《左傳》敘戰 100 餘場，運用兵法謀略取得勝利成功者頗多，值得借鏡參考。本文選擇《左傳》敘戰中，妙用兵法謀略，以取得戰爭之勝利成功者，論證於下，姑名為「策略式因果」。《孫子兵法·計》：「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要之，亦不離「由行為自身的因果關係，以證明善與惡（成與敗）在歷史中所得的審判」。

春秋時代，由原始宗教之迷信，轉向知性理性人文史學之建立，《左傳》一書頗有體現。《左傳·僖公十六年》內史叔興稱：「吉凶由人」；《左傳·昭公十八年》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可見一斑。因此，一切舉動容止，足以決定吉凶禍福，故兵法謀略規劃之良窳，在在影響戰爭之成敗勝負。《左傳》於敘戰津津樂道於此，最可提供後世之經驗教訓。如晉楚城濮之戰（僖 27），晉文公以寡擊眾，大敗楚軍。除《左傳》凸顯「文教」、「德攻」之外，晉國將帥之出謀畫策，多高瞻遠矚，出神入化，每能掌控形勢，化解危機。對於楚軍圍宋，宋人告急求援，先軫高屋建瓴，提出晉軍之總體作戰方針，明確指出「為何而戰」之方向：「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堪稱一舉四得之策略規劃，來年之城濮之戰就是循此作為戰爭指導。接著，狐偃提出「攻其必救」

<sup>80</sup> 明·陳禹謨，《左氏兵略》（臺北：武學書局，1956），頁 15-16、17-21。

<sup>81</sup> 清·李元春，《左氏兵法》，南懷瑾主編：《正統謀略學彙編》初輯（臺北：老古出版社，1978），二卷，頁 7-223。

<sup>82</sup>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2〈兵謀〉，頁 117-142；〈兵法〉，頁 146-164。

<sup>83</sup> 張廷偉，《國學中的管理智慧》（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8），頁 114-151。

之作戰兵謀；戰國時代孫臏「圍魏救趙」之謀略，胎始於此。無論攻其必救，或圍魏救趙，都是避實擊虛之高明策略。晉軍將帥出謀畫策如此，是《孫子兵法》所謂「多算勝」。明宋徵璧著有《左氏兵法測要》一書，論「攻其必救」云：「凡解圍之道，疾趨而救之，其功少；出奇以撓之，而使其圍自解，則其功多。蓋亦致人與致於人之別也。」<sup>84</sup> 因舉蘇峻攻大業，晉王救劉仁恭二戰史為例。由於晉軍盤算，參加此次救宋之軍事行動，可以一舉四得，故志在求戰。然而齊、秦兩國心存觀望，不佞渾水，如何用計能讓齊、秦參戰？中軍帥先軫揣摩人情，巧用連環計：宋賂齊秦，藉之告楚解圍；晉分曹魏之田，以賜宋人；齊、秦喜賂怒頑，必定參戰。計出奉行，無不如意，若非深謀遠慮，如何可能？

子玉先發制人，請晉復衛侯、封曹田，他願意拿「釋宋圍」來交換。子犯不同意，指斥子玉「取二」，太佔便宜。中軍帥先軫考量「我則無禮」、「是棄宋也」等道德性因果；推想「楚有三施，我有三怨」之可能後果，最後提出「私許復曹衛以攜之」之策略，由公開承諾轉變為私下應允，從公然回應敵國條件改換成私秘恢復兩國權益。手段運用不同，效益天差地別。果然，「曹衛告絕於楚」。齊秦既參戰，曹衛又告絕，於是楚國陷入相對之孤立中。論設謀用計之巧妙靈活，楚令尹子玉似乎略遜一籌。

晉師運用激將法，「執宛春以怒楚」奏效，過然「子玉怒，從晉師」。晉軍既處心積慮求戰，眼看戰爭一觸即發，不料晉師往後退避。原本「退避三舍」之承諾，子犯將之轉化為進退兩宜；曲直由我之用兵策略。於是，晉軍已退避三舍之後，果然「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爭又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晉文公母舅子犯用計，進退隨我，循環無端，可悟《孫子兵法·計篇》所云：「多算勝，少算不勝」之提示。

城濮之戰之戰術運用，晉軍亦不疏不漏，水到渠成。如胥臣蒙馬以虎皮，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虛虛實實，以詭道欺敵用兵，所謂兵不厭詐。其他，所謂先犯、橫擊、夾攻等戰術，與兵謀交相運用，因而楚右師、楚左師先後潰敗，楚師敗績，子玉自殺。晉軍以五萬餘人，擊敗楚國十五～二十萬大軍。以寡擊眾之竅門，晉軍兵法謀略規劃得宜，執行如意，所以贏

<sup>84</sup> 明·宋徵璧，《左氏兵法測要》（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四，卷4，僖公27年（楚子圍宋），頁468。

得勝利，而且「一戰而霸」。《中庸》所謂「謀定而後動」，可作策略式因果之不二真言。

語言文字之宣傳，是一種「攻心爲上」之策略運用，可以達到「上兵伐謀」之成效。美妙之外交辭令，飾辭專對，往往賢於十萬大軍。或以之折衝尊俎，或因而化干戈爲玉帛。《論語·憲問》言：「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sup>85</sup>鄭國之外交辭令，經由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四大工夫；其他國家外交辭令之製作，要亦類此。如《左傳》敘寫秦晉麻隧之戰，詳謀而略事，堪稱敘戰之變體。其驚心動魄、匪夷所思處，竟在全錄〈呂相絕秦〉一篇外交辭令（成 13）。

《左傳》「以史傳經」，其天職在勸善懲惡，經世資鑑。敘事傳人，於勸懲資鑑往往三致其意，所謂別識心裁，筆削之義大多聚焦於此。以敘述戰爭而言，攸關戰爭成敗勝負之因素，抉擇去取之際，最多關注與凸顯。如秦晉麻隧之戰（成 13），結果是晉勝秦敗；影響戰役成敗之關鍵因素，竟然是這篇外交辭令。一篇外交辭影響如此重大，於是左氏敘寫戰事，爲提供後世經驗教訓，當然必須全文備載，以供參驗。至於敘事文字，只佔全文六分之一。除補敘交戰原因，敘晉軍點將外，只以孟獻子語預示成敗。接寫作戰地點、秦師敗績，以俘虜二位高階將領作收。變詞令爲敘事，可見左氏筆削之義，別識心裁。清姜炳璋《讀左補義》於此，已略作提示：「傳寫戰諸篇，俱兩國細敘。麻隧之師，亦秦晉大戰也。何以專寫一邊？至晉之若何用謀決勝，俱置不論，但載〈絕秦〉一篇詞命，而秦師之敗，一語已足。」<sup>86</sup>〈呂相絕秦〉一篇詞命，妙在以功過爲核心，就賓主、輕重、詳略作交相運用：於秦爲賓，秦有功於晉，則輕筆略寫，有過，則詳筆重寫。於晉爲主，晉有功於秦，則詳筆重寫；晉有過於秦，則輕筆略寫。<sup>87</sup>於是矯誣誇詐，無所不用其極。其詞令之美妙，固足以悅人耳目，亦容易壞人心術。晉人聞之，足以敵愾同仇；秦人讀之，無不理虧心虛。其生發之「攻心」效益，不容小覷。《左傳》藉言敘事，在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敵愾同仇，促使眾志成城，此中已微露端倪。總之，〈呂相絕秦〉一篇辭令，改變麻隧之戰之成敗。此一經驗教訓，堪作資鑑，

<sup>85</sup> 魏·何晏，《集解》，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卷 17，頁 560-562。

<sup>86</sup> 清·姜炳璋，《讀左補義》，馬小梅主編，《國學集要三編》，卷 22，頁 1048-1049。

<sup>87</sup> 清·韓棻重訂，《批註春秋左傳句解》（臺北：臺北書局，1956），卷上，〈呂相絕秦〉批註引項水心曰：「述己之功，過爲崇護；數秦之罪，曲加詆誣。」頁 216。

故敘次戰爭，乃以詞命替代敘事，蔚為敘事之變體。

《左傳》之敘戰，強調兵法謀略，作為策略式因果之論證，此固左氏之別識心裁，筆削之義所在。史學所以經世資鑑，左氏敘事著力於兵法謀略，經由史料之取捨、歷史之建設、歷史之批評，亦隨比事屬辭之經營，而呼之欲出。除上所論城濮之戰、麻隧之戰二大典型外，事例可以為訓者尚多。今參考《孫子兵法》，再以《左傳》敘談兵謀畫策為例，分離合、奇正、詭道三大策略，舉例論說之。

### （一）離合之策略

分化整體，謂之離；化零為整，謂之合。古之善用兵者，若離若合，不離不合，若遠若近，若擒若縱。如鏡花水月，變幻恣肆，不可方物。明鍾惺評《左傳》有言：「春秋用兵，只講得明『離合』兩字。」誠一針見血之論。

《左傳》敘戰，諸將行軍用兵之際，運用離合之術者，如三分四軍，更番進退（襄 9）；三師肄楚，多方誤敵（昭 30）；或左或右，迂迴側擊（哀 17）；凡此兵謀，多富經世資鑑之意義。楚令尹子重會鄭師以伐宋，諸侯為救宋而伐鄭。晉中軍帥知武子（知罃）提出「三分四軍」之兵謀，作為擾亂敵人的疲勞消耗戰術：將晉四軍整併為三部分，結合諸侯精銳之部隊，採取更番進退，輪迴迎擊敵人之疲敵戰術。終於贏得「三駕勝楚」之成效，奠定晉悼公創霸之利基。其後，伍子胥於春秋晚期襲用之，轉變為「三師肄楚」之伐楚策略，亦導致「楚於是乎始病」之戰果。

吳為小國，與大國楚為敵，國勢兵力懸殊，勝之不易。吳王闔廬請教伐楚之策略，伍子胥提出「三師以肄（肆）楚，多方以誤之」之高明策略。其兵謀之妙，石破天驚；其效益立竿見影：「楚於是乎始病」。六年後（定 4），「吳入郢」，此為張本。所謂「三師以肄楚」，指將吳師三分，輪番作突擊戰：楚軍出，則吳軍退；楚軍歸，則另支吳軍進擊。伍子胥借鏡知武子「三分四軍」，更番進退之疲敵兵略，楚軍必然罷於奔命，累死於道上。吳王從其計，運用再三：「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從此楚「無歲不有吳師」。吳王採「三師肄楚」、「多方誤敵」之策略，於是一敗楚於豫章，再敗於柏舉，三敗而及楚都郢城矣。《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載太宗論兵謀：「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

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李靖深以為然。<sup>88</sup>明陳禹謨〈進《左氏兵略》表〉稱：《左傳》論兵，「括之萬句千章，不出多方誤敵；統及九軍億旅，無如師克在和。」亦所見略同。<sup>89</sup>誠如李靖所云：「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可謂知言。

又如吳越笠澤之戰（哀 17），越王句踐亦使用虛張聲勢，迂迴側擊之法。笠澤（今吳淞江）之戰，越王句踐帥軍攻吳。越王一方面安排左右兩翼，在夜間作或左或右之攻擊，而且擊鼓吶喊前進，吳軍只得分兵抵禦。越王再方面率領三軍主力部隊，進行偷渡，對準吳王夫差的中軍擊鼓進攻。以左右句卒佯攻，虛張聲勢；同時，真正的主力部隊卻以「潛涉」方式登陸，突襲痛擊吳之中軍主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因此能大敗吳師。楚漢之爭，韓信伐魏，蒲坂之役，韓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襲安邑」，<sup>90</sup>奇襲魏王豹，果然大勝而定魏。兵謀之為策略執行，高下良窳關係戰爭之成敗，有如此者。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可能重演，雞父之役，吳人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蔡，於是三國亂，三國敗（昭 23）。吳越構李之役，越王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定 14）。詐術致勝，前後一揆。《左傳》敘記戰爭之成敗，凸顯兵法謀略之規劃與執行，此《孫子兵法·計第一》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左傳》側重因果式敘事，提供後人殷鑑不遠，亦以史傳經之發用。

## （二）奇正之策略

《孫子兵法·勢篇》：「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sup>91</sup>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又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sup>92</sup>論者指出，「正」，指交戰時投入與敵作正面接觸的主攻部隊；「奇」，指將軍手中留下作側重接

<sup>88</sup> 唐·李世民、李靖，《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王貴元、葉桂剛等主編，《唐宋兵書名著精華》（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卷下，頁 77。

<sup>89</sup> 明·陳禹謨，《左氏兵略》，頁 17。

<sup>90</sup>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1066。

<sup>91</sup> 曹操等，《十一家注孫子》（臺北：里仁書局，1982），曹操注：「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筌注：「當敵為正，傍出為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頁 66。

<sup>92</sup> 同上，曹操注：「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杜佑注：「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梅堯臣注：「用正合戰，用兵勝敵。」頁 68。

應，或發動突擊之機動部隊。<sup>93</sup>易言之，奇正相對，奇，指不尋常、出乎意料、所謂秘密武器；正，則是正規、正常。守備部隊為正，機動伏兵為奇；正面攻擊為正，迂迴側擊為奇；明攻為正，暗襲為奇。

唐太宗與李靖談《孫子兵法》，請李靖「為諸將言其要」；李靖謂：「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且以為：若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將無法認識「虛是實，實是虛」<sup>94</sup>。兵貴用奇，《左傳》敘戰述兵謀，其例頗多。如蒙馬虎皮、克敵氣竭、擊敵未陣、潛師潛涉已述於前，今再舉三例，以見春秋中期襄公前後，左氏敘戰之抉擇去取，筆削之義，已略有差異。世風好尚不同，人情品味使之然也。春秋不得不變為戰國者，時移勢遷故也。

如吳楚長岸之役（昭 17），楚軍俘獲吳國先王之乘舟餘皇，吳公子光派三位身材魁梧壯碩的人潛伏在船邊。在夜晚三次呼喚應答中，不免暴露目標。藉由三位「長鬣人」之犧牲小我，造成楚國大軍之混亂；吳人乘亂敗楚，奪回了餘皇。《武經總要》云：「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平道」；伍子胥對闔廬，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舟楫於吳越人之重要，由此可知。何況，餘皇為「先王之乘舟」，得喪之際，意義非凡。吳公子光為此發動特攻，長鬣三呼用機動之奇兵，配合吳國大軍「夜從之」，奇正相生，終於取回餘皇，大敗吳師。

無獨有偶，以出奇之動作，生發意外之勝利者，又有燧象奔吳之史例，如吳入郢（定 4），吳楚交戰，吳軍欲發動攻擊，若依正規戰鬥，就是「正」。但夫概王向吳王闔廬建言，希望在楚軍「半濟」時，吳軍才展開攻擊，這種策略規劃，真是匪夷所思，不循慣性思維。理由是：「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鬥心矣！」設想週到，所以再次戰勝楚軍。夫概王畫謀用策，是用「奇」。楚昭王使臣下「燧象奔吳」，用的也是奇計。戰國時田單復國，用火牛陣，亦脫胎於此。<sup>95</sup>

吳楚交戰各用奇計，即吳越交鋒時，越王句踐亦突發奇想，運用奇計，所

<sup>93</sup> 奇正的概念，與古代數學的奇偶概念和餘數概念有關。餘奇即一，是數字變化的關鍵。祇要手中留有「餘奇」，就有可能造成任何變化。在軍事上，機動力量也被稱為「餘奇」。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勢第五〉，頁 34-36。

<sup>94</sup> 唐·李世民、李靖，《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頁 46。

<sup>95</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 82，〈田單列傳〉，頁 998。



謂「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如吳越槁李之役（定 14），越王句踐爲了打破吳軍嚴整的軍陣，先派敢死隊再三衝鋒擒捉吳軍，吳軍陣腳不動如山。不得已，句踐推出罪犯，排成三行，把劍放在脖子上，齊聲說：「兩國交戰，我觸犯軍令，罪該萬死，請求自首而死！」說完一一自殺身亡。歷歷在目，吳軍爲之側目！就在此刻，越王趁機下令攻擊，於是大敗吳軍。做出非比尋常之舉動，獲致出乎意料之戰果，此謂之「奇」。

清李元春《左氏兵法》引《尉繚子》曰：「治兵者，秘于地，邃于天，生于無明。此庶可想此奇秘！」<sup>96</sup>清王源《左傳評》曰：「兵法無他，奇正而已。變化無他，不測而已。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不測之術也！」<sup>97</sup>觀此，可知《左傳》敘戰，注重抉擇去取，凸顯影響戰爭成敗之兵謀，經驗教訓真可供行軍用兵，經世致用之資鑑。

### （三）詭道之策略

《孫子兵法·計篇》：「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曹操注：「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王皙注：「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眾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sup>98</sup>用兵雖本諸仁義，然其取勝之道則在用詭使詐，世所謂兵不厭詐。《左傳》敘麻隧之戰（成 13），載錄〈呂相絕秦〉示以詭道致勝，自是之後，以詭道取勝者漸多，伍子胥之破楚，范蠡之滅吳，是其明證。

行軍用兵之道，在守經達權。宋梅堯臣注《孫子兵法》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sup>99</sup>爲求克敵致果，行權用詐，自是情非得已，所謂兵不厭詐，可以知之。爲篇幅所限，考察《左傳》敘戰之以詭道行權，取制敵取勝者三例，以見左氏好言兵，不棄詭道之一斑。如楚武王侵隨（桓 6），楚鬥伯比「毀軍示羸」，是一種「以眾示寡，以強示弱」之欺敵策略，允稱詭道之奇者。隨臣季梁看出楚王之詭計，直指「楚之羸，其誘我也！」隨侯聽從勸諫，不迷惑楚師之示羸，因而免除一場災難。「毀軍示羸」之詭道，後世多有採取發用者，如漢高祖見欺於匈奴，受困於白登，就因匈奴冒頓「匿其精兵，

<sup>96</sup> 清·李元春，《左氏兵法》，卷下，頁 40、41。

<sup>97</sup> 清·王源，《左傳評》，卷 10〈越子伐吳〉總評，頁 25。

<sup>98</sup> 曹操等，《十一家注孫子》，卷上，頁 12。

<sup>99</sup> 同上。

見其羸弱。」<sup>100</sup>其他，如後漢虞詡、晉李拒、石勒、宋武帝、宋高祖、陸子隆諸人，皆重演歷史，要皆「毀軍示羸」詭道之流亞。<sup>101</sup>

又如懸門不發，鄭用空城計退敵（莊 28）。楚軍伐鄭，由於事出突然，鄭國無備，楚師長驅直入，而逼近遠郊之門、外郭門、城外大路市集。是時，鄭人隨機應變，以詭道行權：「縣（懸）門不發，楚言而出」，鄭示楚以閒暇，若無其事，故不閉城門。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謂：「縣門不發，此是鄭誘敵之空城計。」「楚言而出」者，謂楚帥等既入城，識破鄭以空城計相誘，乃復操楚語退出。所以楚言者，明楚不中計。<sup>102</sup>鄭國面對大兵壓境，施用空城計，應變得法；楚帥子元肯定鄭有人才，乃夜遁離去，危機遂告解除。「懸門不發」之空城計，後世多有借鏡，如《蜀書》載：趙雲擺脫曹軍追擊，「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操疑有埋伏而去。<sup>103</sup>諸葛亮空城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司馬懿猥見勢弱，疑有伏兵而退。其他史書如《南史》、《魏略》、《陳書》、《隋書》、《唐書》、《舊唐書》皆有「空城計」之類似記載。<sup>104</sup>

又如平陰之役（襄 18），晉人疏旆示多，亦詭道之運用。此一戰役，晉人「旆而疏陣之」，以示其多；真人假人，乘車左右；且又曳柴揚塵，如大軍奔馳。此種詭道欺敵戰術，竟欺瞞了齊靈公，「畏其眾也，乃脫歸。」對於晉人於平陰之役，運用疏陣示多，左實右偽、曳柴揚塵諸詭道退師，後人踵事增華者極多。見諸《史記》者，如沛公與秦軍戰於藍田，益張疑兵旗幟；張良欲擊秦嶢下軍，益張旗幟為疑兵。韓信井陘口之戰，拔趙幟立漢幟二千，皆其顯例。<sup>105</sup>其他，見於史書者，如岑彭、吳漢多以張旗鼓破公孫述軍，馬防救臨洮、賈逵退吳軍、董卓服洛陽，杜預襲樂鄉，劉裕討桓玄，乃至於李世民解場帝圍，王雄誕敗走李子通，皆用疏陣示多、益旗幟為疑兵之詭道而獲勝。《左戰》敘戰，強調兵法謀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之經驗教訓，經由筆削凸顯如此，真堪作經世資鑑之參考。

<sup>100</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 110，〈匈奴列傳〉，頁 1190。

<sup>101</sup> 明·陳禹謨，《左氏兵略》，卷 3，頁 71-73。

<sup>102</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242。

<sup>103</sup> 晉·陳壽著，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卷 36〈蜀書〉引〈趙雲別傳〉，頁 813。

<sup>104</sup> 明·陳禹謨，《左氏兵略》，卷 6，頁 116-121。

<sup>105</sup> 《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留侯世家〉、〈淮陰侯列傳〉，頁 168、805、1067。

清韓友一評詭道用兵，曾言：「兵極眾者，必虛；極寡者，必實。蓋多，則張勢以恐之，少則匿形以誘之。先為不可料以制人，古人往往如此。故見眾無懼，見少無慌。」<sup>106</sup>《孫子兵法·虛實》：「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杜牧注：「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sup>107</sup>可見，詭道行權，虛實難測，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既可以克敵致果，又可以遠禍避害。觀此，可見詭道行權之於用兵行軍，誠可隨方而取則，究心以淹通者。《詩·大雅·蕩》：「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sup>108</sup>此之謂也。

## 四、結語

《左氏》傳經，往往融會「如何書」與「何以書」，而蔚為敘事之藝術。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討論《春秋》筆削之義有言：「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孔子作《春秋》，蓋本《魯春秋》進行抉擇去取、調劑變理。史料經由別識心裁之筆削，始見微言大義，乃成一家之言。由章學誠論孔子《春秋》筆削之義、別識心裁，類推以研究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雖不中，亦不甚遠。

就歷史敘事與解釋渾然為一而言，《左傳》據事直書之四大手法，即以敘為議、屬辭比事、藉言作斷、側筆烘托，其抉擇去取，銓次群言，亦猶工師之度材，名醫之調劑，中有別識心裁。余英時以為章氏所謂《春秋》「筆削之義」，內涵實遠較「史料取舍」為豐富；當包括史料取舍、歷史建設與歷史批評三者。左丘明據孔子《春秋》而作《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經，亦自有其筆削之義與別識心裁。

《左傳》之敘事邏輯，有二元論述：一則側重象徵性敘事，一則凸顯因果式敘事。後者側重行為動機，強調行為和後果間之必然聯繫。是春秋史官，企圖脫離原始宗教之制約，致力道德秩序建構之敘事策略，不失為文化建設之創新活動。徐復觀早已指出：《左傳》因果式敘事之重大成就有三：其一，以行為之因果關係，代替了宗教的預言；其二，由行為自身之因果關係，證明善惡

<sup>106</sup> 清·李元春，《左氏兵法》，卷下，頁138，眉批引「韓友一曰」。

<sup>107</sup> 曹操等，《十一家注孫子》，卷中〈虛實篇〉，頁92。

<sup>108</sup>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3），頁499。

在歷史中所得的勸懲；其三，綜合調理因果關係，避免了偏枯抽象之論述。左氏最可貴者，當在「把宗教性的預言，轉變為行為的責任，以合理性代替了神秘性」，人文史學之建立，左氏有推助之功。《左傳》強調天人合德、天人交錯，經由人事道德因果之敘事，移作成敗興廢之判斷準據，此種敘事方式，最值得大書特書。今選擇因果式敘事，以見《左傳》企圖跳脫原始宗教，建立人文史學之一斑。

《左傳》敘述戰爭，往往以道德倫常為標準，作為善惡因果之審判。戰爭敗亡固起於失德毀常，和平勝利亦緣於修德省德，明德綏德。《左傳》戰爭之敘事藝術，出之以道德性因果，蓋融合歷史之敘事與解釋於一爐，而張揚任德尚義、寢兵息民。《左傳》於天人之際，頗多關注。述存亡之跡，稽興廢之理，寓論斷於敘事之中，即成《左氏》之別識心裁，筆削之義。以楚莊王勝晉之盛，稱霸中原之威，而現身說法強調武德，人文史學之建構，已隱然成形。又如城濮之戰前，晉文公教民以義、信、禮、恭，亦側重強化軍人武德，以道德作為精神武器。

行軍用兵，領導統御方面，將帥之人格特質，往往影響戰爭之成敗，如城濮之戰，楚令尹子玉致命之個性，注定了楚軍敗亡之命運。《左傳》敘述《春秋》以來之戰爭，禍端多歸咎於失德、無德，成公二年晉齊鞏之戰以前多如此。大抵周德未衰，流而未滅，而以禮義相支持。其後漸變為戰國，於是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漢劉向《戰國策書錄》之感慨，不為無端。晉齊鞏之戰之敘事策略，別識心裁，筆削之義，仍以政治倫理為依歸。襄公之後，世變日亟，人心不古，周德漸衰，遂多不凸顯道德性之因果敘事。

《左傳》之敘戰，呼應史書資鑑勸懲之使命，舉凡影響戰爭勝負，將帥成敗之因素，往往盡心致力凸顯，津津樂道敘寫。據筆者考察，影響戰爭勝負成敗之因素，依序為謀略之高下、將帥之性情、士氣之盛衰、武備之利鈍、軍隊之多寡，而以兵法謀略最為關鍵。史書既所以述往知來，因此從歷史事件之個案，歸納綜合出經驗教訓，甚至抽象出解決問題之原理原則，變得很有價值。兵戎戰爭，既為國家大事，《左傳》為春秋一代之實錄，自然徵存極為詳備。兵法謀略既影響行軍用兵成敗之關鍵，影響家國存亡、國際秩序，故《左傳》敘載尤多，最便於經世資鑑。

《左傳》一書，已由原始宗教之迷信，轉向知性理性人文史學之建立。《左

傳·僖公十六年》內史叔興稱：「吉凶由人」；《左傳·昭公十八年》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由此可見一斑。因此，人類一切舉動容止，多足以決定吉凶禍福。故兵法謀略規劃之高下良窳，在在影響戰爭之成敗勝負。如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以寡擊眾，大敗楚軍。除《左傳》凸顯「文教」、「德攻」之外，晉國將帥之出謀畫策，多高瞻遠矚，出神入化，每能掌控形勢，化解危機。

語言文字之宣傳，是一種「攻心爲上」之策略運用，可以達到「上兵伐謀」之成效。美妙之外交辭令，飾辭專對，往往賢於十萬大軍。或以之折衝尊俎，或因而化干戈爲玉帛。《左傳》敘寫秦晉麻隧之戰，詳謀而略事，凸顯〈呂相絕秦〉一篇外交辭令，堪稱敘戰之變體。秦晉麻隧之戰，結果是晉勝秦敗；影響戰役成敗之關鍵因素，竟然是這篇外交辭令。於是左氏敘寫戰事，爲提供後世經驗教訓，當然必須全文備載，以供參驗。至於敘事文字，只佔全文六分之一。變詞令爲敘事，可見左氏筆削之義，別識心裁。

《左氏》以史傳經，而史學所以經世資鑑。《左傳》之敘戰，強調兵法謀略，作爲策略式因果之論證，《孫子兵法·計》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此固左氏之別識心裁，筆削之義所在。《左傳》敘春秋時代諸戰役，觀其史料之取捨，顯然側重兵法謀略之勾勒。蓋過往例史可能重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左傳》敘戰，側重因果式之策略敘事，歷史之建設、歷史之批評，亦隱含於其中。戰爭之成敗，攸關謀略之高下，殷鑑不遠，亦以史傳經之發用。除城濮之戰、麻隧之戰二大典型外，再分離合、奇正、詭道三大層面，舉例論說之。如《左傳》敘戰，運用離合之術者，如三分四軍，更番進退；三師肆楚，多方誤敵；或左或右，迂迴側擊；凡此兵謀，多富經世資鑑之意義。

兵貴用奇，《左傳》敘戰述兵謀，其例頗多。如蒙馬虎皮、克敵氣竭、擊敵未陣、長鬣三呼、燧象奔吳、罪人三行等等。可見襄公前後，左氏敘戰之抉擇去取，筆削之義，已略有差異。《左傳》敘戰自麻隧之戰，敘錄〈呂相絕秦〉示以詭道致勝，自是之後，以詭道取勝者漸多：伍子胥之破楚，范蠡之滅吳，是其明證。考察《左傳》敘戰之以詭道行權，制敵取勝，以見左氏好言兵，不棄詭道之一斑，如毀軍示羸、縣門不發、疏陣示多。「前車覆，後車可鑑」，歷史之經驗教訓，經由筆削凸顯如此，真堪作史學經世之資鑑。世或質疑《左傳》喜談兵，稱許詭道，以爲不合孔子聖人之旨。筆者以爲：聖人之好惡愛憎，與歷史之據實直書不可同日而語。《左傳》敘記春秋戰爭，或以詭道致勝，或

以奇術克敵，或妙於離合虛實，則亦直書其事，信以傳信而已。實錄所以提供資鑑，此即史書經世之意義。何況影響戰爭成敗之因素，除策略式因果之敘事外，《左傳》更標榜事在人爲之道德性因果。

《左傳》之敘戰大抵存有雙重模態：一方面體現任德尚義，標榜寢兵息民，是爲道德性之因果。一方面又講究兵法謀略，追求克敵致勝，是爲策略式之因果。道德性因果與策略式因果之兩致並書，相反而相成，皆有益於經世與資鑑。

## 參考書目

### (一) 「傳統文獻」 (時代先後排序)

1. 周·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2. 周·左丘明著，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3. 戰國·孟軻著，漢·趙岐注，清·焦循疏，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4. 戰國·孟軻著，宋·朱熹注，《孟子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5. 漢·董仲舒著，蘇輿疏，《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6. 漢·司馬遷著，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
7.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82
8.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9. 魏·曹操等，《十一家注孫子》，臺北：里仁書局，1982
10. 魏·何晏，《集解》，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11.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12. 唐·啖助、趙匡著，陸淳釋，《春秋集傳纂例》，臺北：大通書局，1970
13. 宋·李昉等纂集，《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2
14. 宋·蘇轍，《春秋集解》，錢儀吉，《經苑》本，臺北：大通書局，1970
15.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
1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17. 元·趙汭，《春秋師說》，清·徐乾學、納蘭成德校訂，《通志堂經解》第26冊，臺北：大通書局，1970
18. 明·陳禹謨，《左氏兵略》，臺北：武學書局，1956
19. 明·宋徵璧，《左氏兵法測要》，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
20.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1. 清·王源，《左傳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22.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點，《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23. 清·康熙御定、紀昀等主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24. 清·朱彝尊著，林慶彰等編審，《點校補正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7
25.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
26. 清·汪中著，蔣秋華、林慶彰編著，《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27. 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臺北：里仁書局，1980
28. 清·姜炳璋，《讀左補義》，馬小梅主編，《國學集要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29. 清·李元春，《左氏兵法》，南懷瑾主編，《正統謀略學彙編》，初輯，臺北：老古出版社，1978
30. 清·劉熙載著，徐中玉等校點，《劉熙載論藝六種》，成都：巴蜀書社，1990
31. 清·韓菼重訂，《批註春秋左傳句解》，臺北：臺北書局，1956
32.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

## (二) 「近人論著」(姓氏筆劃)

1. 王貴元、葉桂剛等主編，《唐宋兵書名著精華》，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2. 申小龍，《語文的闡釋》，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4
3.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
4.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5.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6.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總經銷，1997
7. 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經的性質》，《臺大文史叢刊》第二十八種，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1969
8. 李桂生，《兵家管理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 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10. 吳闓生，《左傳微》，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11. 汪高鑫，《中國史學思想通論·經史關係論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12. 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特質》，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
13. 洪鈞培，《春秋國際公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14.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15.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章太炎全集》第二冊，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16. 張廷偉，《國學中的管理智慧》，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8
17.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18. 張高評，《左傳導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19. 張高評，《左傳之文韜》，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
20. 張高評，《左傳之武略》，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
21.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22.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
23.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解經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
24. 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臺北：萬年青書店，不著年月
25. 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6.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3
27.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1973
28.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
29. 閻步克，《論樂官、史官文化傳承之異同及其意義》，《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1998



# Narration of Causalities and Elaboration of the Classic through the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War Narratives in Zuo zhuan

Chang Kao ping\*

## 【 Abstract 】

Zuo zhuan uses historical narratives to elaborate the Classic, Chunqiu. It does not always depend on materials from Chunqiu, but often uses earlier, later, even differential materials and follows the writing rules of “the way to write” and “the reason to write” to elaborate the Classic through the history. Zuo zhuan’s narrative follows two modes: the symbolic narrative and the causal narrative. The causal narrative emphasizes motivations of historical figures’ behavior and implies the inevitable links between human behavior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events. This method of writing makes thre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First, it explains happenings as the outcome of one’s behavior instead of the mysterious prophecies of religion. Second, it sets the judgment of good and evil in history on account of human behavior. Third, it avoids biased or abstract arguments by comprehensive collations of the causalities of one’s behavior. The mode of writing brings forth a world of ethics in Zuo zhuan, in which behavior of virtue becomes the evidence to justify human success. This study takes war narratives in Zuo zhuan as research examples and examines historical figures’ behavior in terms of the operation of causality. The cases manifest that immoral behavior results in war and defeat while self-cultivation leads to victory and peace. Clearly, Zuo zhuan’s war

---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arratives imply the significance of moral causalities. The art of war narratives in Zuo zhuan evidently lies in the emphasis on morality as the crucial factor in history.

**Key words:** Zuo zhuan War Narratives Moral Causalities Causal Narratives  
Elaboration of the Classic through the History